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研究

冯辰元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

DOI:10.62836/ssr.v3n4.1427

摘要：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第二，上述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南北区域差异，南方地区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北方地区；促进效应亦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异质性，高经济水平省份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低经济水平省份；促进效应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带动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且这一效应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数字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区域异质性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Chenyuan Fe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significantly boosts rural residents' per-capita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Second, the above-mentioned promotion effect presents prominent north-south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ith a stronger effect in southern China than in northern China. Heterogeneity also exists across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provinces with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show a much stronger promotion effect than those with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Moreover, the effect features obvious region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middle-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ness a markedly stronger effect than other region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nd such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sound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high agglome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residents' cultural-education-entertainment expenditur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农村地区渗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标志着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进入政策加速期。从实践层面看，移动支付与数字信贷已成为农村数字金融的核心应用场景：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业务达339.33亿笔，同比增长33.03%；截至2025年7月，全国普惠型农户经营性贷款中数字信用贷款占比已突破50%。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正经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深刻转变，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1950.68元，同比增长15.9%，高于食品烟酒等生存型消费。然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省际差距依然显著，数字金融服务的区域渗透程度亦参差不齐。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这一促进效应在不同区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理解上述问题，对于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作为衡量农村消费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从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教育投资意愿等微观视角对农村家庭教育文化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李普亮和贾卫丽（2010）的研究揭示了家庭在校子女数量、教育支

出结构及家长对教育投资性质的认知等关键变量的作用[1]。然而，殷红霞（2008）的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普遍面临严峻的货币收入约束，教育投资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文教娱乐消费的根本因素[2]。与此同时，石明明等（2019）的宏观层面的消费结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等发展型消费的支出弹性近年来趋于下降，且受流动性约束和消费习惯的制约效应显著[3]；而周建和杨秀祯（2009）发现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性”效应及城乡联动机制的存在，则进一步表明农村消费已非孤立系统，外部制度环境与宏观经济因素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农村家庭的消费决策[4]。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为缓解农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升消费便利性提供了新的制度方案。江红莉和蒋鹏程（2020）从宏观层面，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从微观层面证实了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5,6]。然而，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消费总量或基础型消费，对于文教娱乐等发展型消费的专项考察尚显不足，且研究结论存在分歧。更为重要的是，陈小辉等（2020）、肖静等（2023）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但既有文献多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或绿色发展等维度加以识别，鲜有研究将区域异质性的分析视角聚焦于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这一具体领域，更缺乏对南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长江中下游区域集聚特征的系统考察[7,8]。基于此，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以期在数字普惠金融微观福利效应的既有认知基础上，为理解其消费促进效应的边界条件与区域差异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作为弹性较大的发展型消费，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流动性约束的变化最为敏感，胡宝娣（2010）指出，农村家庭普遍面临严峻的货币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加之医疗、教育等支出不确定性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文教娱乐消费潜力长期受到抑制。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缓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9]。从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视角看，易行健和周利（2018）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信贷、移动支付等多元化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服务门槛，使原本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弱势群体获得信贷支持[10]。陈铭聪和程振源（2021）的研究表明，消费信贷能够有效缓解居民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扩大其预算边界，使农村家庭能够将更多当期和预期的收入资源配置于文教娱乐等发展型消费[11]。从便利居民支付的视角看，易行健和周利（2018）发现，移动支付等数字金融工具突破了传统现金支付的空间和时间约束，降低了支付过程中的“疼痛感”，加速了消费决策[10]。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认为，移动支付等数字金融工具使农村居民能够以更低交易成本参与线上知识付费、数字文化产品消费等新兴文教消费领域[6]。此外，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通过提供数字保险等金融服务降低了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改善消费者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南北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王胜鹏等（2022）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中南北方向的差距大于东西方向的差距，南方地区整体领先于北方[12]。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促进效应依赖于区域的经济基础条件和金融生态环境，张伟和黄子祺（2024）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

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区域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服务的充分渗透和消费效应的有效释放[13]。南方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使得农村居民对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更高，数字普惠金融便利性向文教娱乐消费的转化效率更为畅通；而北方地区因数字鸿沟和消费环境约束，这一传导效应相对受限。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高经济水平省份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普及率及金融服务密度等方面均优于低经济水平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并非无条件发生，其有效发挥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支撑，唐文进等（2019）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发挥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只有当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阈值后，其促进作用才能充分显现：高经济水平省份文教娱乐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供给足够丰富、消费环境成熟，数字金融便利性能够有效转化为实际文教娱乐消费支出；而低经济水平省份因市场供给不足、消费场景有限，即便数字金融服务可得，其消费释放效应也难以充分显现[14]。此外，低经济水平地区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和金融服务实际使用深度，宋晓玲（2017）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的惠及效应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基础薄弱地区的传导效率相对有限，从而削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向文教娱乐消费的传导效率[15]。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李研（2021）的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地区的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变动频繁且提升显著，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活力较强[16]。数字经济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何雷华等（2022）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邻近地区的乡村振兴，其间接效应甚至大于直接效应[17]。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群联动效应显著，核心城市的数字经济红利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地区，使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渗透更加充分、金融服务生态更加成熟，农村居民能够更便利地利用数字金融工具参与文教娱乐消费；而其他地区因数字经济集聚程度较低、城市群联动效应较弱，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

深度和消费转化效率相对不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南方地区、高经济发展水平省份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该正向效应更为突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3—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3%和97%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经上述处理后，最终获得341个有效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核心变量数据来源如下：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控制变量的数据整理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ln_RECE），采用各省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衡量。在已有探讨农村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学者们对“教育文化投入”的衡量方式存在差异。部分研究侧重于使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如李牧辰和余瑶懿（2024）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问卷中“当年子女教育投资”的具体金额作为代理变量，以精准识别家庭层面的当期教育决策[18]；李淑铃（2024）则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一步将分析聚焦于“15岁以下子女的教育支出”，以规避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个体异质性对家庭主动支出决策的干扰[19]。这类微观数据虽能精确捕捉家庭层面的异质性决策，但受调查周期限制，多为非连续截面数据，难以刻画教育文化投入的长期动态演变趋势。与之相比，本文采用的省级宏观面板数据具有

时间连续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能够从更长的历史维度反映各地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整体水平与变化规律，为评估数字普惠金融的宏观政策效应提供更稳健的经验证据。此外，相较于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林锦鸿（2021）所使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教育产出类指标，对家庭可支配收入、信贷约束及支付便利性等经济环境变化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消费决策的理论逻辑更为契合[20,21]。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参照现有宏观层面研究的常见做法，将各省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最终衡量指标。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ln_INDEX），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取对数衡量。该指数基于蚂蚁集团关于金融业务的广泛数据编制而成，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刻画，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数字金融服务的渗透程度和多元化特征。本文使用总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处理以缓解异方差问题并便于解读弹性系数。

3.2.3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李晓钟和李俊雨（2022）、刘桂英等（2025）等学者的做法，选取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城镇化水平（URB）、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TIS）、金融发展水平（FINDEV）、政府干预程度（GOV）和经济发展水平（AGDP）[22,23]。各变量的具体定义与计算方式见表1。

3.3 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教育文娱支出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_RECE_{it} = \beta_0 + \beta_1 \ln_INDEX_{it} + \gamma \text{Control}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RRCE_{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份在第 t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的对数值； $\ln_INDEX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省份 i 在第 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对数值； $Control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年份共同的宏观冲击和政策影响；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教育文娱支出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第（2）列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全部控制变量，两列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1）列结果显示， $\ln_INDEX$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文教娱乐支出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第（2）列加入控制变量后， $\ln_INDEX$ 的系数为1.605，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经济含义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平均提高约

1.605%。这反映出农村家庭教育文娱消费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反应较为敏感。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1的预期，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4.2 异质性分析
4.2.1 南北区域差异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参考孟维福等（2023）做法参照欧向军（2006）等以35° N纬线为界区分南北地区的划分方法,将全样本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两组[24,25]。表3报告了南北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北方和南方两组的 $\ln_INDEX$ 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南方组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北方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南方地区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刘赛楠（2023）以及卢现祥和王素素（2021）的研究表明南方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整体领先于北方，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与应用场景更为丰富，农村居民对数字支付、数字信贷等金融服务

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文教娱乐支出	ln_RECE	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取对数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ln_INDEX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综合指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	OPENNESS	进出口总额 / 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化水平	URB	非农业人口 / 户籍人口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TIS	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
	金融发展水平	FINDEV	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 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干预程度	GOV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地区生产总值
	经济发展水平	A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表2. 基准回归

	(1)ln_RECE	(2)ln_RECE
ln_INDEX	2.441*** (0.487)	1.605*** (0.304)
Constant	-6.683** (2.737)	-5.607** (2.416)
控制变量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341	341
R ²	0.907	0.941

注：括号内为省份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p<0.10, ** p<0.05, *** p<0.01。下表同。

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更高，从而更有效地转化为教育文化消费支出[26,27]。张幸（2020）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缓解流动性约束等间接渠道，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形成显著带动作用，而南方地区更完善的基础条件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效应[28]。上述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存在南北区域差异，南方地区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北方地区。

表3. 南北区域差异检验结果

	(1) 北方 ln_RECE	(2) 南方 ln_RECE
ln_INDEX	1.558*** (0.523)	3.072*** (0.451)
Constant	-0.171 (3.281)	-10.202* (5.721)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176	165
R ²	0.953	0.948
组间系数差异p值	0.035	

4.2.2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是否因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参考齐绍洲和罗威（2007）的做法，按各省份样本期内人均GDP均值的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低经济水平组和高经济水平组[29]。高经济水平组包括安徽省、湖南省、辽宁省、陕西省、山东省、湖北省、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天津市、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其余为低经济水平组。表4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两组的ln_INDEX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高经济水平组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低经济水平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蓝乐琴和杨卓然（2021）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30]。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一定阈值后，其消费释放效应才能充分显现，高经济水平地区已跨越这一门槛，而低经济水平地区仍受限于

发展阶段的制约。第二，李牧辰和封思贤（2020）指出，区域差异和数字鸿沟等因素会制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总体收敛效果。高经济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金融生态更成熟，农村居民将数字金融便利性转化为实际文教消费的条件更充分，而低经济水平地区则因数字鸿沟的存在，其边际效应尚未充分释放[31]。综上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高经济水平省份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低经济水平省份。

表4.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检验结果

	(1) 低经济水平 ln_RECE	(2) 高经济水平 ln_RECE
ln_INDEX	1.083** (0.413)	2.220*** (0.412)
Constant	-0.713 (2.415)	-8.342*** (1.827)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176	165
R ²	0.955	0.917
组间系数差异p值		0.070

4.2.3 长江中下游区域差异

为进一步考察特定经济区域的差异化效应，本文参考徐维祥等（2022）的空间异质性分析思路，结合地理与经济规划惯例，将长江中下游七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划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组，其余省份划为其他地区组进行分组回归[32]。表5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两组ln_INDEX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长江中下游组的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其他地区组，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在该区域更为突出。究其原因，长江中下游是我国数字经济高水平集聚区域，城市群联动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渗透更充分，区域内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资源配置效应发挥更充分，因而对农村文教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这一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集聚差异，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表5. 长江中下游区域差异

	(1) 长江中下游 ln_RECE	(2) 其他地区 ln_RECE
ln_INDEX	2.919** (1.030)	1.255*** (0.419)
Constant	-10.647 (8.683)	-2.571 (2.679)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77	264
R ²	0.936	0.945
组间系数差异p值	0.080	

4.3 内生性检验

本文借鉴田相辉等（2023）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选取各省邮局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POST_INTERNET）的交互项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工具变量[33]。从相关性来看，邮局作为传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其历史布局与新一代数字金融服务的空间渗透存在路径依赖，邮局网络覆盖越完善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基础往往越好；而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反映了地区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习惯与普及程度，对当期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从外生性来看，随着移动互联网对传统邮政业务的替代效应日益增强，邮局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对当期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直接影响渠道已基本消解，满足排他性要求。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两变量构造为交互项，以同时捕捉地区层面的截面差异与时间维度的动态变化。

表6报告了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邮局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邮局网络与互联网使用基础越好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符合理论预期。第一阶段F统计量为17.001，且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ln_INDEX的系数为4.533，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

方向一致，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教娱乐支出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6.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第一阶段 ln_INDEX	(2) 第二阶段 ln_RECE
POST_INTERNET	0.6005*** (0.1456)	
ln_INDEX		4.533*** (1.625)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F值	17.001***	17.35***
N	341	341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总于表7。第一，参考雷雷等（2023）的做法，剔除2020年及以后样本[34]。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行为和数字金融服务使用模式产生了显著冲击，可能导致农村文教娱乐支出出现非典型波动，从而使基准回归结果部分地反映疫情特殊时期的变化而非整个样本期的稳定关系。为验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2020年及之后年份样本剔除并重新回归。表7列（1）结果显示，ln_INDEX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核心结论未发生改变。第二，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效应，同时为缓解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其滞后一期值进行回归。表7列（2）结果显示，ln_INDEX_LAG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第三，剔除直辖市样本。参考杨本建等（2026）的做法，为排除行政级别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样本重新回归[35]。直辖市在行政级别、财政体制和经济结构上与普通省份存在系统性差异，其农村地区的特征也难以代表全国一般情况。表7列（3）结果显示，剔除直辖市后，ln_INDEX的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结论一致。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剔除2020年及以后 ln_RECE	(2) 滞后一期 ln_RECE	(3) 剔除直辖市 ln_RECE
ln_INDEX	1.801*** (0.399)		1.501*** (0.337)
ln_INDEX_LAG		0.653* (0.365)	
Constant	-9.216** (3.968)	-2.061 (2.956)	-5.736 (4.3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217	310	297
R ²	0.954	0.938	0.952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3—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各省邮局数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剔除直辖市样本及排除疫情冲击年份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结论均保持稳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1%，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平均提高约1.605%，反映出农村家庭教育文娱消费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反应较为敏感。第二，上述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南北区域差异，南方地区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北方地区；促进效应亦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异质性，高经济水平省份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低经济水平省份；促进效应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效应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带动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且这一效应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数字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向农村地区纵深发展，着力缩小南北地区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之

间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差距，尤其应加大对北方地区和低经济水平省份农村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力度，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第二，充分发挥长江中下游等高数字经济集聚区域的引领示范作用，鼓励区域内成熟的数字金融服务模式和经验向其他地区复制推广，通过区域间的协同联动带动全国农村文教消费市场的整体提升。第三，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应注重与农村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和文化产品供给，降低农村家庭教育文化支出的实际负担，使数字金融的便利性更有效地转化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意愿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李普亮,贾卫丽.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0,(3):73-85.
- [2]殷红霞.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 [3]石明明,江舟,周小焱.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9,(7):42-60.
- [4]周建,杨秀祯.我国农村消费行为变迁及城乡联动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9,44(1):83-95+105.
- [5]江红莉,蒋鹏程.数字普惠金融的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效应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40(10):18-32.
- [6]何宗樾,宋旭光.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财贸经济,2020,41(8):65-79.
- [7]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水平? [J].证券市场导报,2020,(7):20-29.
- [8]肖静,曾萍,章雷敏.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J].华东经济管理,2023,37(4):1-12.
- [9]胡宝娣.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西南大学,2010.
- [10]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 [11]陈铭聪,程振源.移动支付普及对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来自CHFS的微观证据[J].消费经济,2021,37(6):50-

- 59.
- [12]王胜鹏,滕堂伟,夏启繁,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创新驱动机制[J].经济地理,2022,42(7):33-43.
- [13]张伟,黄子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韧性的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24,(8):55-64.
- [14]唐文进,李爽,陶云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28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9,34(6):35-49.
- [15]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5.
- [16]李研.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2):60-77.
- [17]何雷华,王凤,王长明.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中国乡村振兴?[J].经济问题探索,2022,(4):1-18.
- [18]李牧辰,余瑶懿.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影响农村教育?——基于农民收入与教育财政的分析[J].教育与经济,2024,40(4):23-34.
- [19]李淑铃.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D].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24.
- [20]郭庆旺,贾俊雪.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J].经济研究,2009,44(10):22-35.
- [21]林锦鸿.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与城乡教育差距[J].中国农村观察,2021,(3):128-144.
- [22]李晓钟,李俊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2,(2):77-93.
- [23]刘桂英,陈跃灵,谢文君,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6,25(1):100-109.
- [24]孟维福,李莎,刘婧涵,等.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23,(3):102-111.
- [25]欧向军,沈正平,王荣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格局演变探析[J].地理科学,2006,(6):641-648.
- [26]刘赛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财经大学,2023.
- [27]卢现祥,王素素.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的南北差异及形成机理[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1):21-42.
- [28]张幸.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20.
- [29]齐绍洲,罗威.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J].经济研究,2007,(7):74-81.
- [30]蓝乐琴,杨卓然.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J].财经问题研究,2021,(12):49-57.
- [31]李牧辰,封思贤.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文献的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10):84-91.
- [32]徐维祥,周建平,刘程军.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J].地理研究,2022,41(1):111-129.
- [33]田相辉,刘新民,徐小靓.数字经济与创业空间分布[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12):100-111.
- [34]雷雷,张大永,姬强.共同机构持股与企业ESG表现[J].经济研究,2023,58(4):133-151.
- [35]杨本建,唐金汶.数字经济与区域产业布局[J].经济研究,2026,61(3):238-260.

